

江苏档案

江苏省档案局 主办
(第一一五期)

风雨人生路 悠悠岁月情

——记知青楷模董加耕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兴起了一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千城镇知识青年带着理想、激情、信仰,有组织地走向农村和边疆。如今,当年的他(她)们已不复青春,但“知青”一词作为时代的烙印,成为那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董加耕,1940年出生,江苏省盐城葛武公社董伙夫大队人(现为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高庄镇董伙夫村)。1961年5月,他毅然放弃保送北大学习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董加耕曾是毛主席的座上宾,与主席靠背背,同席吃饭;也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特许守灵7天7夜,陪着主席走完最后一程。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为他的《务农日记》题词,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在共青团“九大”会议上号召广大青年向他学习。作为一代知青的杰出代表,董加耕的行为影响了上世纪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小伙在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上,书写了不平凡的岁月颂歌。



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集中地剖析了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先进人物的事迹。



董加耕近照

1 放弃北大 立志耕耘



1961年5月,江苏知青董加耕回乡务农。

董加耕就读的龙冈中学是盐城地区重点中学,高中三年,他一直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被盐城地区教育部门树立为赶超苏州高中的标兵。1960年他被推荐入党,1961年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各门功课平均成绩超过96分。因为品学兼优,学校决定保送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深造。

盐城地区多为盐碱地,是苏北水乡有名的“锅底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曾一度是江苏的“三考”。对于董加耕来说,如果没有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他很可能按部就班上了大学,实现寒门子弟的梦想,离开贫瘠的故土。但人生就是充满未知和偶然。三年困难时期,加上大跃进虚报浮夸,乡亲们吃的是定量的盐蒿

子、豆饼,很多人因此患了浮肿病,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在那场天与地的残酷抗争中,董加耕的父亲因为吃了春天爆青的茨菰汤,中毒离世,临终前他甚至咬碎了嘴巴里的陶瓷汤勺。对于乡亲的疾苦,董加耕有着远胜于常人的切肤之痛和清醒的认识。离开农村,更是必然的选择。

但机会来临时,董加耕却犹豫了。这种变化看似难以理解,实则有其缘由。他出生农村,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如果不是解放,他很可能延续老一辈子,难有上学的机会。盐城是革命老区,村村都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在党的号召和革命先烈的影响下,他决定放弃个人眼前利益,以拳拳爱党心,造福桑梓。“回农村去,就算救不了乡亲们,但是搞好一个生产队,解决温饱总可以吧?”这是当时的董加耕最质朴的想法。

即便现在来看,读书也是很多人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出路,何况还是被保送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董加耕决意回乡务农,可想而知遇到了多少阻力。先是含辛茹苦、望子成龙的母亲难以释怀,再是亲友们议论纷纷说别人读书越读越远,董加耕越读越近是个傻子。而老师、同学也认为董加耕放弃保送北大,对他同学肯定有负面影响。但董加耕抱定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想法,毅然在志愿书上写下“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大字。1961年5月4日,带着满腔热情和书籍,董加耕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夫大队第四生产队。为了表明决心,他还将自己的名字“董家庚”改为“董加耕”,誓要努力耕耘家乡,以实际行动践行他“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踏淤泥,心忧天下”的理想。

3 毛主席生日 被奉座上宾



1964年12月26日,周总理带着董加耕(左三)邢燕子(左一)等参加毛主席寿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1岁生日,也是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给自己过生日,董加耕有幸成为那次生日宴会的亲历者。当天,作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加耕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下午临会前,一位服务员突然通知他,让他不要离开就地等待。其他人纷纷离去,只留下董加耕、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四人。几分钟后,周总理从后堂出现,手一招说:“跟我来。”董加耕等人也不

多言,紧随总理来到了湖南厅。朱德委员长也在那里,闲聊几句后,周总理和朱老总引领董加耕等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南角的小宴会厅,陈毅、贺龙、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人正坐于此,谈笑风生。周总理指着董加耕等人介绍道:“这几位是主席请来的客人。”董必武曾为董加耕的务农日记题过词,他和董加耕握手时还笑着说:“小董还是老本家啊。”此时,厅内已经摆好三张桌子,呈品字型,并布置好了餐具,董加耕这才意识到毛主席这是要请他们吃饭。

2 扎根农村 善谋巧干



1963年3月董加耕在田头向群众宣传农业科学知识

上大学与下农村,无疑天壤之别。当时正值我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期,想要改变农村面貌,谈何容易,但董加耕却凭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毅力和善谋巧干创造了奇迹。

解放生产力 报告换耕牛

葛武公社多是水田,困难时期没有牛,董加耕就带头和老百姓一起拉犁拉耙,一拉就是三年。但人拉犁效率低,活太苦太累,大家吃不饱,更使不上劲。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董加耕思付着这第一步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引进耕牛。于是董加耕带了两个老农,没有一分钱,仅揣着一份介绍信“葛武公社董伙夫大队董加耕前来买耕牛”,便前往方强农场了。农场的场长接过介绍信,看看董加耕,揣测地说:“你这个董加耕不是广播和报纸经常宣传的董加耕啊?”两老农忙点头应是。场长见是“名人”,热情得很说:“你要几头牛啊?你们两个老农去挑吧。”因为董加耕当时还是大队支委、民兵营长,考虑到别的生产队也需要耕牛,他便希望能牵回12头牛,保证每个生产队有2头牛。场长答应得爽快,董加耕却因为身无分文,踌躇起来。但想着乡亲的期盼,他还是硬着头皮说:“我一分钱没有,能不能打个欠条,秋天等水田改旱田,长了棉花就还你们。”场长没犹豫就答应了,但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求董加耕留下来给农场的职工、学生作报告。这边董加耕留在农场作报告,那边牛顺利牵回了,老百姓非常高兴,给牛披红戴花,敲锣打鼓,在村子里游行。因为董加耕在家排行老二,大家都感慨地说“董二哥把我们解放出来了,不用人拉犁了”。

科技务农 为农创收

牛牵回来了,但董加耕所说的水田改旱田还是初步设想,真要实施难度很大。葛武公社一直种着水稻,地多劳动力少,加上管理不到位,产量很低,还经常误了农时。董加耕曾经在队委会提出,种棉花没那么辛苦,收益还高。但1958年大跃进时葛

武公社曾尝试过种棉花,结果棉花没长出来,粮食也没收。这对庄稼人来说无疑是剜心之痛。

虽然种棉花的提议屡次被老农泼冷水,但董加耕坚信科学的力量,他和农技师通过调研、仔细分析,认为大跃进时搞棉花,失败在于摊子铺得太大,措施也没跟上。这次董加耕没搞一刀切,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稻田改为旱田,匡了一百亩水田改种棉花。那些老党员、老贫农说:“不得了,这个小孩子发疯了,他搞不起来,我们肯定要喝西北风”。但董加耕没有丝毫动摇,执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直面种种挑战。葛武公社的土壤是酸性的,要种好棉花必须用碱中和,当时没有碱肥厂,董加耕就带领群众到黄海边去收集草木灰,改善土壤;遇到劳动力不够,他又回到母校盐城中学、龙冈中学,请学生们放假来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每亩收皮棉71斤,水改旱的100亩地搞成功了,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并取得不俗的成绩。

董加耕一直信守有文化不用等于没文化,一定要结合实际,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水田改旱田成功,乡亲们真正见识到科学对农业的意义,对董加耕的看法也发生质的变化,由不解到认同,对他的评价也由“傻子”变为“到底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不一样”。而他所倡导的水田改旱田,以及后来实践的一熟变三熟、稻、麦、棉、绿肥轮作制等做法在当时确属惊人的创造,这些经验不久便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无惧阻力 兴修水利

全国解放这么多年,农民为什么还吃不饱,这其中自有自然环境和旧观念的因素。但董加耕偏偏是个不认命的,他认为人一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束手待毙。先天条件不好,完全可以通过后天改善。为此他动了十足的脑筋,搞水利改造环境,通过平整耕地,分块治理,铺设排灌渠,保证农业生产的旱涝保收。

这些措施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当时并不是一帆风顺,遇到不少“人为”阻力。在他回乡那年,盐城当地报纸《益阜大众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嘉庚改加耕》,在十里八乡中,董加耕迅速成了“名人”。虽然董加耕红了,但他仍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向前干。那几年他先后当过场头保管、场头组长、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而村里的干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的干部还有个旧观念,认为董加耕有文化,能吃苦,群众拥护,还有点名气,将来肯定要取代自己,所以在背后给董加耕使了不少绊。

面对这些阻力,董加耕既坦然又淡然。在他看来,党员的本质就是要为人民谋福利,自己已有文化,是生产队长,又是共产党员,做好工作那是义务,而流言纷扰不过是乌云蔽日,只待清风。

4 不坐“小车”的中央首长



原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组长王道义夫妇(右三、左二)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程绍沛(左一)等专程看望出席共青团新老劳模座谈会的知青董加耕(右一)、邢燕子(右二)、侯隽(左三)

1975年春,江苏省委派人拿着毛主席的批文到盐城,调查董加耕去北京出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

副组长。当时董加耕刚从“5·16”事件中平反,担任盐城县委书记,生活平静下来不久。妻子眼泪汪汪不希望他去,怕他离权力中心太近,又被卷入政治斗争。董加耕自己也很无奈,“自己带头上山下乡,怎么跑到北京去了?”但想归想,董加耕还是如约启程了。要说董加耕这个人,出生农村读过书,干过农活当过官,泥腿、扬风车农活干的一套,当官批阅文件也难不倒他,可偏偏没有官样,用老话说就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何况他总是套着半旧不新的中山装,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口音浓重,还不愿坐“小车”。几十年前,小汽车是稀罕物,能坐上轿车那是身份的标志。在京为官,小车那是标配,董加耕不是不懂其中的玄机,偏偏揣着明白装糊涂,保留着“泥腿子”的本色。而董加耕的这种个性也让他出了不少洋相。

5 不改初衷 老而弥坚

正如爱人所担心的,董加耕又一次陷入政治漩涡。文革后期,董加耕作为国务院知青小组成员,曾被江青召见,他因此接受了一年多的审查。1977年底,董加耕从北京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夫大队参加生产劳动,直到1982年落实政策,才被任命为郭猛乡副乡长,分管工业生产。

此时的董加耕已是不惑之年,但他仍不减当年水田拉犁的那股韧劲。为了解决郭猛乡办企业资金、原材料等问题,他数次北上徐州、南下苏州。1985年,为了促成郭猛乡农药厂定于一事,他甚至跑到省长顾秀莲那里寻求帮助,并最终解决了问题。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郭猛乡工业总产值由1982年的800万元,增长到1985年的1700多万元。生产范围也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产品行销适口,甚至远销到国外。

1987年,董加耕调任盐城市郊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先后分管生产、科技、企业改革和

管理工作。郊区乡镇企业有1000多个,为了迅速熟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他马不停蹄地跑基层、搞调研。一年四季,多数时间都奔波在外,有时在乡下条件有限,他就凉水泡饭,也觉得甘之如飴。一位60年代曾采访过他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到盐城旅游,想顺道找他叙叙旧,但电话打了几个,董加耕或是刚走,或是还没回来。局里的同志实在不好意思便对记者说:“您还是晚上到他家找人吧!董局长是连轴转的轮子,很难把握他的踪迹。”确实如同所言,董加耕是日夜连轴转,永不知疲倦。1991年抗洪排涝,他负责责任区一带,连续几个月吃住基层,甚至连回家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有位北京来的记者专程到盐城采访他,等了五天都没机会见到人,急得火烧眉毛,后来终于在伍佑排涝工地将他“逮”住,而那篇报道的题目就叫“见到了董加耕”。

6 董加耕《务农日记》摘抄

1961年5月9日
校长传达了沈书记同意我走向第一线的消息,并且谈了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一定要能吃苦耐劳,踏实地干出成绩来。接到此通知,我比考上大学还高兴,因为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朽之钢。

1961年6月16日
我的母亲总是这样说:人家正业,顺全都做了先生,每月拿钱,问我为什么这样回来吃苦。我回答:先生固然需要人去做,但不能人人去做教师啊!至于说社员生活苦,我认为这是片面的,难道今天的生活比从前拿枪打敌人还苦吗?今天不过多流些汗,我们青年人应站在最前线。青年人应当在斗争中在艰苦中谋求人生的幸福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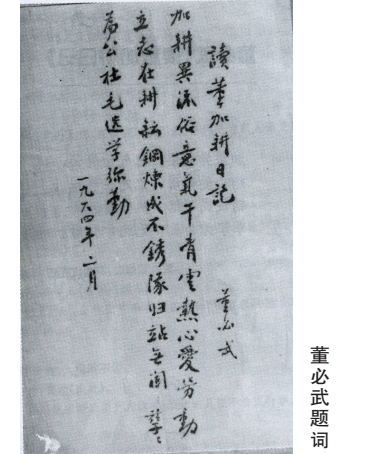
1961年6月19日
我认为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在战争时期,拿着枪杆和敌人作战,不怕牺牲,是当时革命所决定的。而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今

天,党对青年提出的要求是不怕艰苦、从事向自然斗争的伟大事业。每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

1962年11月8日
我是大队党支部的监察委员,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公社党委做出口头和书面汇报。有人也许说我多管闲事,对自己没利,反而妨碍了自己的进步。我看不然。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干,有利的话就勇敢地讲,是真理就坚持,哪怕牺牲自己的一切,也须这样。

1963年2月15日
有人劝我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当农民,对自己的进步是有利的,当时我这样回答:“越复杂,越要坚持,越困难,越能锻炼人。不能因为哪个地方复杂,就逃避困难。”

1963年7月7日
革命干部应当带头劳动,不然就会忘本,忘掉阶级兄弟。五亿农民能劳动,我为什么不能呢?



董必武题词

本期协办:盐城市档案局
本版供稿:滕建平 王静
本期组稿:苏海霞